

新周刊

世界观

2010

《新周刊》主编

周有光
张贤亮
章诒和
任志强
李银河
周春茅
詹宏志
汪涵
曹景行
芮成钢
曾子墨
李咏
陈扬
李佳明
贾樟柯
许巍
王冉
严锋
舒国治
梵高奶奶
廖新波
孔二狗
邵夷贝
刘君祖
许舜英
黎坚惠
邓小宇
谢峰
王冀豫
关栋天
吉米
马诺

文匯出版社

世界观

2010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观2010/《新周刊》社编.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496-0029-8

I. ①世… II. ①新… III. ①世界观一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4565号

世界观 2010

编 著 者/《新周刊》

出 版 人/桂国强

责任编辑/刘 刚

特约编辑/谭山山 刘 瑛

封面设计/万得福

版式设计/姚 冰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译文印刷厂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60千

印 张/8.75

印 数/1-10000

书 号/ISBN 978-7-5496-0029-8

定 价/25.00元

序

每个人的世界小得不得了。你也是，我也是，名人也是。

除非小世界向别人打开。

一人一副眼镜，看世界；一人一种态度，说出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这就是《新周刊》做了四年的“世界观”栏目。

名人在此，变成了人名。他们脱去了公众形象的马甲，露出血肉，内心开始独白。

在这里，名声如浮云，成功学显得可笑。各人被当代社会情境所激发的思考和选择，才真正与公众心意相通。

多位当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透过《新周刊》和朱慧憬等采访者，向读者打开。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困惑、折腾、反思、坚持、狡辩、偏执，也可以看到他们如何自恋、自律、自我暗示、自圆其说、自我解嘲、自我激励。

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你心有戚戚。

我们生活的世界，搞来搞去，还是那个坚硬的世界。但，世界观比世界大。

《新周刊》执行副总编 何树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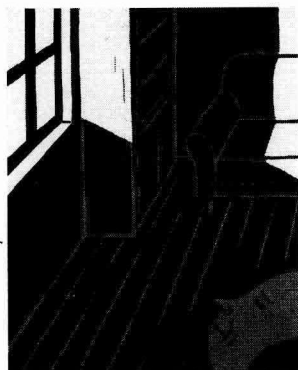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周有光：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	002
张贤亮：我是复杂的中国人的代表	010
章诒和：科学的生活比幸福的生活更重要	018
任志强：没有数据很难交流表达	026
李银河：人比自己想象的要自由得多	040
周春芽：要珍惜每一次婚姻每一次爱情	048
唐宏志：我是一个害怕影响力的人	060
汪 涵：舞台上那个是戴了面具的汪涵	068
曹景行：60岁，是自由的开始	076
芮成钢：好时代培养坏习惯	084
曾子墨：我不太喜欢和智商太低的人打交道	092

李 咏：人轴有轴的好处.....	100
陈 扬：请大家忘记电视上的陈 Sir	108
李佳明：我就是那个忧郁的喜剧演员.....	116
贾樟柯：我特别痛恨将劳动浪漫化.....	124
许 巍：人没必要跟自己较劲.....	134
王 冉：我从没想过多少岁之前要挣多少钱.....	142
严 锋：以后我会写穿越小说.....	150
舒国治：我就这样晃荡了57年.....	158
梵高奶奶：我就是这棵向日葵.....	166
廖新波：我是一个没门的人.....	174
孔二狗：我可能确实有暴力情结.....	182
邵夷贝：我就文艺女青年.....	190
刘君祖：《易经》就是处理问题的智慧.....	198
许舜英：忠于自己不是一种自恋.....	204
黎坚惠：我在换那口“中年”的“牙”.....	212
邓小宇：安定令人堕落.....	220
谢 峰：穿不好牛仔裤一定不是时尚潮人.....	228
王冀豫：人只有想不到的苦，没有受不了的苦.....	236
关栋天：君子之交，不出恶言.....	244
吉 米：我不爱女人，也不爱男人，我更爱自己.....	254
马 诺：有钱就可以找到爱我的男人.....	262

世界观比世界大。



周有光：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

周有光：生于1906年，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33年与张允和结婚，1946—1949年由新华银行派往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1954年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调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至退休。《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委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

我的生活没有安排，现在离休在家里面，我还讲笑话说：我是无业游民，没有工作的。我的朋友知道我没有事情干，常常买了书送我。我什么书都看，人家送来什么书，我就看什么。

有的东西觉得有价值，我就摘录下来，有时候一本书摘录成一篇很短的文章，再花工夫把它压缩。另外，有什么感想呢，我就随便写一点东西，主要是历史学和文化学的问题。有

的东西要写几个月，有的东西半天就写出来了。

我到了85岁才离开办公室。现在年纪大了，105岁了，不能活动，就在家里面。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张小桌子，半间小屋子，这是我的世界。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我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很重视字母学，就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自己看，觉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许多年有用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学是不行的，而当时这个学问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导大家对字母学有一点了解。想不到这本小书出来以后很风行，一下子印了几版。这项工作在今天发挥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机，发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

我买了个手机，现在耳朵不灵了，眼睛也不灵了，用手机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面联络还是用电脑。我是最早用电脑写文章的，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电脑。我一早就提

倡用电脑来处理汉字,当时有的人不赞成,后来大家都用电脑了,也用不着我提倡了。电脑当然是好东西,可是好东西都是有坏处的,坏处就是小孩子现在不会写字了。外国也有这个问题。外国人原来也讲究字写漂亮,现在无所谓了,连美国总统都不会写字了,你看奥巴马,都是随便写的,这就是电脑的坏处。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

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得对我就改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然有阶级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

我不新潮。因为我长期在美国,受美国的坏影响太多,美国的坏影响当中有一个,就是喜欢新的。美国没有“新潮”这个词,因为大家都新潮;在中国,就反对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这个名词了。我无所谓新潮,我觉得生活要发展嘛,信息化跟电脑是分不开的,每个国家都要进入信息化,所以每个人都要新潮,这样才行。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因为宁夏那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

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30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国家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你看我带回来的，用了30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带去，开了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吗？

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你怎么敢上飞机的？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的。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的生活的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困难就是八年抗战、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给你讲个笑话，那个时候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粮票不够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协楼去吃饭，不在家里吃饭。到政协吃饭，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薄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用——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度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

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个庙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年轻的和尚来给我们冲茶，我们就问他：你年纪轻轻怎么做和尚呢？他说：我是考上来的啊，考上来做和尚，工资比外面加一倍。我问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说：当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来上班。这叫“工资和尚”，现在的和尚都是这样了。本来和尚是靠庙宇的独有财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庙宇财产都归公了，和尚没有财产，不就没有饭吃了吗？就靠工资了。现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一步一步走上去，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

（采访 / 丁晓洁）

采访手记

在周有光那间被各类书籍塞得满满的小房间里，他每天的会客时间有两个：早上9点以后，下午3点以后。会客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来访者的信息。他说自己是“来者不拒”，什么人都欢迎，什么问题都回答。他把来访者皆视为朋友，人家说朋友有好坏之分，他则是好朋友接受，坏朋友也接受，笑称只要自己不学坏东西就行。

隔三岔五有媒体来采访，中国的美国的英国的，最近甚至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的记者也跑来找他。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周有光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摊开桌上每天都要看的几份报纸：《参考消息》、《新京报》和《人民日报》，他一边用红色的笔做标注，一边跟我侃侃而谈。他说自己当初被造反派骂：“你们这许多的专家，专家专家，专门在家。”说完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实际上在整个谈话中，他都是这样的：把所有艰难的时光，统统当成笑话来讲。



张贤亮：我是复杂的中国人的代表

张贤亮：1936年生于南京。1957年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接受劳教、管制，监禁二十余年，其间曾外逃流浪，讨饭度日。1979年9月获平反。曾任宁夏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现任镇北堡西部影城董事长。代表作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我身上集中了强盗、流氓、劳改犯、书生、英雄、作家等各种人的特性，我就是个复杂的中国人的代表。

我身上的确有流氓特性，不过是大流氓的特性。影视城（编注：指镇北堡西部影城）建立不久，有人在影视城前面种树，我就给部下打电话，说你给我准备一个推土机，把树全部给我推倒。如果不是那次把树推倒，现在那片地已经是人家的了。这，一般书生能做得出来吗？书生没有办法，就找领导。而我采取的方法是以暴制暴，这是那个时代给予我的特质。